

爲堅決肅清胡風 反革命集團而鬥爭

熊復著

2/20

中国青年出版社

書號 788 政法 72

爲堅決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而鬥爭

著 者 熊 復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3/4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18,000

印數 1—25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3)0.07元

自從人民日報揭露了胡風和他的集團的反革命罪惡活動以後，批判胡風思想的鬥爭就轉入了徹底肅清反革命的胡風集團及其思想影響的鬥爭。這是一場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反對反革命胡風集團的鬥爭給我們大家敲起了警鐘。這就是說，反革命的胡風和他的集團的活動證明，我們對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決不能熟視無睹，我們對當前的政治鬥爭決不能漠不關心，我們對越來越複雜和尖銳的階級鬥爭形勢決不能有任何鬆懈麻痹的情緒。

人民日報發表揭露反革命的胡風和他的集團的材料以後，我們大家確實都吃了一驚。我們又是激怒，又是覺得有些意外。正如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所說，對於胡風和他的集團，我們很多人雖然感到了他們的反對馬克思主義，也感到了他們的向黨進攻，但是卻沒有感到或者沒有深刻感到他們的反對革命。這也就是說，在胡風和他的集團的反革命罪惡活動還沒有被揭露以前，我們很多人還弄不清楚他們的面目：除了那些真正被欺騙因而盲目地跟着胡風跑的人以外，其餘的人，到底是革命隊伍裏犯有政治錯誤的一些人呢，還是鑽進革命隊伍、打着革命假招牌、而以破壞革命為目的的一羣別有用心和別有來歷的人呢？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們受了胡風和他的集團的欺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們很多人在政治上存在着麻痹思想。人民日報發表的材料和編者按語把我們大家的眼睛都打開了。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根據已經發表的材料，明確地告訴我們，胡風是一個反革命分子，而以胡風爲首的集團是一個反革命集團。他們長時期以來僞裝擁護革命，而實際上却是潛藏在革命人民內部，幹着反革命勾當。

事實證明，以胡風爲首的這個反革命集團是有政治背景的。胡風和他的集團的許多骨幹分子痛恨中國共產黨，痛恨人民，痛恨革命，痛恨新中國和新社會。在全國解放以前，他們衷心擁護蔣介石國民黨的反人民內戰，而對人民革命的勝利懷着刻骨的仇恨；在全國解放以後，他們更加瘋狂地仇視新中國和新社會的一切，並且企圖潛伏下來進行更加隱蔽的反革命活動。顯然，他們這種立場是同我們的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的立場完全一致的。胡風和他的集團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不但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有密切的聯繫，而且用他們對於我們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的攻擊直接配合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反革命行動。他們中間的許多骨幹分子，包括胡風本人，有的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特務分子，有的是革命叛徒，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有的是自首變節分子。比如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阿壠就是一個軍統特務，另一個骨幹分子綠原就是一個“中美合作所”的特務。胡風集團既然是由這樣一些別有用心和別有來歷的人組成骨幹，他們混入革命隊伍目的就只是爲了破壞革命，這就是他們自己所說的“挖心戰術”和“孫行者鑽進肚皮的戰術”。而這一切，他們都是用冒稱革命的僞裝掩蓋起來的。這就是說，他們隱瞞了自己的政治面目。

拿胡風來說，我們面前便有兩個胡風。一個胡風，照胡風自己的表白，是中國共產黨在文學事業方面的一個合作者。他，我們黨的這位可敬的“合作者”，多年以來就是“追隨革命事業”的，所作所

爲是“符合黨的政治綱領”的，在“羣衆眼中”還是“一個站在黨底週圍的文學工作的組織者”。要是能够相信，他同中國共產黨在文學事業上的“合作”似乎還達到了這樣的地步：在胡風方面，用胡風自己的話來說，“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他胡風“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而在黨這方面，有如胡風集團所一向大肆宣揚的那樣，只是在胡風身上才找到現實主義的保衛者和堅持者。這樣的“合作”關係，應當說，在胡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存在着共同的政治和思想的基礎，譬如說，“對於敵、友、我的愛愛仇仇的態度”。

然而還有一個胡風，這就是真面目的胡風。根據已經揭發的材料，胡風對於黨，對於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對於團結在黨的週圍的進步作家和革命知識分子，老早就懷抱着咬牙切齒的痛恨、仇視和敵對的態度。對於我們黨的這位可敬的“合作者”，他所一貫仇視的“官方”，竟不是國民黨反動派，而是中國共產黨；他所惡毒咒罵的“權貴”、“欽差”、“老爺們”、“公子們”，竟不是國民黨的張道藩之流，而是中國共產黨在文藝方面的負責同志；他所厭棄到頂的“市儈”、“政客”、“蛆蟲”、“魔鬼”，竟不是國民黨反動派豢養的法西斯文人墨客，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隊伍，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週圍的進步作家和革命知識分子；他所不惜“抱着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用盡一切“戰法”和“戰術”，向之進攻並且決不“妥協”的“對象”，竟不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文藝方面竭力扶植的封建的、買辦的和法西斯的黑暗勢力，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作爲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革命文藝運動。

胡風的這種反革命立場，是符合他的反革命政治背景的。原來胡風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變成了革命的“逃兵”，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過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政治工作，以後在抗日戰爭時期更和國民黨的許多特務頭子建立密切聯系。他

一直用“革命”的假招牌混在革命文藝隊伍裏，進行着分裂破壞革命隊伍的罪惡活動。

畢竟事實是最無情的。現在，有目共睹的事實證明了，在胡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政治和思想的基礎，因為胡風所揮舞的刀鋒，不是指向國民黨反動派，而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現在，有目共睹的事實也證明了，胡風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和革命隊伍既然抱着這樣的深仇大恨，他的全部活動就不能不具有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性質。現在，有目共睹的事實還證明了，胡風的一切關於文學創作和批評方面的“現實主義”的宣揚，即使不提他對於現實主義的嚴重歪曲，也不過是掩蓋他的反黨反人民反革命活動的幌子。事實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追隨革命事業”的、“符合黨的政治綱領”的、以現實主義的“保衛者”和“堅持者”自居的胡風，却是戴着各種各樣假面具而在革命陣營內部進行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的胡風！

胡風集團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集團，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政治集團，這是由胡風本人和他的集團的許多骨幹分子的政治背景所充分證實了的。如果說，在胡風集團的假面具還沒有被揭穿以前，我們很多人雖然感到了他們的反對馬克思主義，也感到了他們的反對黨，但是沒有感到或者沒有深刻感到他們的反對革命，這已經證明我們的政治嗅覺不靈敏，政治覺悟不高，缺乏階級警覺性；那末，在胡風集團的假面目被揭穿以後，面對着大量的鐵一般的事實，我們中間還有人似信非信，或者信而有疑，總想把這個集團的面目設想得和善一些，認為胡風不過是一個“文化人”，認為“胡風事件不過是文化界的事件”，認為“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未免言過其實”等等，這就只能證明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不是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就是出於階級本能的同情，而這種對於反革命分子的可憐的同情心，對於革命人民來說只能是異己階級的卑劣的

有害的東西。

二

表面上看，胡風和他的集團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而宣揚一套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好像只是犯了思想上的錯誤，或者至多犯了政治上的錯誤。現在，問題已經弄清楚了，胡風和他的集團不只是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而宣揚一套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他的全部活動是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因此，胡風和他的集團的全部活動，既不是普通的思想錯誤，也不是普通的政治錯誤。

即使僅僅從思想鬥爭的範圍來說，胡風和他的集團長期地一貫地有系統地偽裝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偽裝下宣揚一種直接同馬克思主義相對立並且以反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爲目的的所謂“理論”，這也已經不只是普通的思想錯誤或政治錯誤。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的世界觀，是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思想武器，正因爲這樣，一切工人階級的敵人都痛恨馬克思主義，都要想方設法來反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藉以解除工人階級的思想武裝。我們從胡風的密信中可以看到，他是極端仇恨馬克思主義的，他把馬克思主義當做“大敵”，他把“唯物主義”當做“市儈”的哲學，而且說要給以“致命的打擊”。他“打擊”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又是偽裝馬克思主義，極盡曲解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能事。我們從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所謂“建議”中可以看到這種曲解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的例子。胡風和他的集團在馬克思主義的偽裝下反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其目的就是要解除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思想武裝。他們所以必須偽裝馬克思主義，只是因爲馬克思主義已經深入中國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在中國人民中享有極大的威信。由此可見，胡風和他的集團長期地、一貫地、有系統地在馬

克思主義偽裝下反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這只能證明胡風集團抱有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不可告人的陰謀目的。

胡風和他的集團還不只是假冒了馬克思主義之名來反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由於他們是以文藝界為其活動的地盤的，他們還在馬克思主義的偽裝下，狂妄地捏造了一個所謂“機械論的統治”這個藉口來反對和攻擊中國共產黨，反對和攻擊黨的文藝政策，反對和攻擊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他們所捏造的這個藉口，即所謂“機械論統治”，不僅包括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也不僅包括左翼作家聯盟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思想的宣傳，而且包括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馬克思主義藝術思想的經典著作的出版和傳播。我們從胡風分子的密信中可以看到，他們特別敵視和痛恨毛主席的這個講話，誣蔑這個講話是“圖騰”（原始社會的人把動物或其他自然物當做神聖來崇拜就叫做“圖騰”）。從一九四二年以來，他們反對和攻擊的主要目標就是毛主席的這個講話。胡風在一九四八年發表的“論現實主義之路”這個反動的小冊子，其內容就完全是反對毛主席這個講話的。他採用的方法又跟上面所說的一樣，是偽裝擁護毛主席的講話，偽裝擁護黨的文藝政策和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有如他在密信中所說的：在字面上要“順着”說幾句。胡風集團分子，都是採用同樣的方法來誣蔑和攻擊黨的文藝政策和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誰都知道，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正如黨對其他革命事業的領導一樣，是正確的、堅強的和有成效的，因為黨用來指導文藝運動的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藝術觀。在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方面，根本不存在甚麼“機械論的統治”，任何關於“機械論的統治”的言論，都是對於黨的領導的誣蔑和攻擊。可是，自稱為“追隨革命”和“站在黨底週圍”的胡風和他的集團，却狂妄到硬要捏造甚麼“二十年的機械論的統治”，來誣蔑和攻擊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顯然，他們

這種誣蔑和攻擊，不過是他們用來進行反黨反人民反革命活動的一個捏造的藉口。

胡風集團的反對和攻擊中國共產黨，反對和攻擊黨的文藝政策，反對和攻擊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已經達到瘋狂的程度。他們誣蔑和攻擊黨的中央和中央負責同志，說甚麼黨的中央是“董事會”，說甚麼“董事會無內行專家”，說甚麼黨只是“就左右人士的說話中取平均數”，也就是誣蔑和攻擊黨的中央對於文藝事業的領導不是正確的。他們誣蔑和攻擊黨在文藝方面的負責同志，用了一切最惡毒的字眼來咒罵這些負責同志，僅僅因為這些同志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藝術觀，堅持了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和黨的文藝政策。他們誣蔑和攻擊黨領導的文藝戰綫，說革命文藝界是甚麼“殭屍統治的文壇”、“籠罩着絕大的苦悶”、“帶上了枷”、“把現實主義的生機悶死了”等等，僅僅因為革命文藝界是由黨領導的，革命文藝事業是黨領導的中國人民整個革命事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胡風集團還誣蔑和攻擊黨所團結的一切進步作家和革命知識分子，說他們是甚麼“市儈”、“政客”、“寶貝”、“蛆蟲”、“蒼蠅蚊子”、“強盜和騙子”等等，僅僅因為這些進步作家和革命知識分子是團結在黨的週圍，承認和接受黨的領導，並在黨的領導下在文藝戰綫上進行奮不顧身的鬥爭。胡風甚至誣蔑革命烈士聞一多為“投機”，僅僅因為他轉到了愛國民主的立場。他也不屑同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起紀念魯迅和屈原，背地裏罵紀念魯迅是“無聊”，罵紀念屈原是“跳加官”。

胡風和他的集團自以為是“追求革命”的、“與人民共命運”的、“符合黨的政治綱領”的、有“小資產階級立場和革命性”的、“站在黨底週圍的文學工作的組織者”，而實際上這些都不過是假招牌。他們對於黨，對於黨領導下的文藝事業和文藝隊伍，實際上抱着

敵對、仇視和痛恨的態度。事實證明，他們反對和攻擊黨是一貫的，而且是越來越猖狂的。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他們還只是在這樣或那樣的文藝問題上，比如在民族形式問題上，反對和攻擊黨的觀點，反對和攻擊黨的文藝政策；而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他們就把這個講話當做主要目標，集中地反對和攻擊毛主席的這個講話，也就是反對和攻擊黨的全部觀點，反對和攻擊黨的整個文藝政策，反對和攻擊黨對文藝運動的全面的領導；而到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中國人民進入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他們更瘋狂地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向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綫不斷發動進攻。他們從他們的反革命立場和反動“理論”出發，極力詆毀和攻擊黨的文藝方針和文化政策，詆毀和攻擊黨所發動的思想批判和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並在去年七月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提出了一個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文藝—政治的綱領。這個綱領包括的範圍有：反對作家學習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作家進行思想改造，反對作家同工農兵結合並為工農兵服務，反對在文藝上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傳統，反對作家為當前的政治任務服務，反對黨對文藝運動的統一領導。按其性質，這個綱領顯然不只是針對着文藝工作部門和文藝工作者，而且針對着國家生活的一切部門，針對着一切知識分子和幹部。如果照着胡風集團的這個綱領做去，那末，共產黨就要瓦解，國家就要瓦解，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也就要瓦解，而這當然是妄想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願望。胡風集團這一套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在我國進入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出現這個事實，決不是偶然的，它不但是胡風集團的反黨反人民反革命活動的歷史合乎邏輯的發展，並且也是我國當前階級鬥爭形勢複雜化和深刻化的反映。

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風和他的集團在文藝方面的活動，抱有廣泛的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目的。他們選擇了文藝領域作為他們的活動地盤，不只是企圖按照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世界觀和藝術觀來改造中國人民的文藝事業，而且是企圖在文藝領域潛藏下來，以便他們易於假冒革命，易於騙取共產黨和羣衆的信任，易於發展和擴大他們的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

不僅如此，他們選擇了文藝領域作為他們活動的地盤，還因為他們企圖利用文藝這個階級鬥爭的最銳利的武器，從思想上和政治上來腐蝕和瓦解我們黨，腐蝕和瓦解我們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以便達到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反對中國革命的陰謀目的。

三

胡風分子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還有極其卑鄙、極其醜惡、極其陰險的一面，這就是他們長期經營和組織了一個陰謀集團來專門從事反對和攻擊黨的罪惡活動。這個陰謀集團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證明，他們是採取了最卑鄙的資產階級政治手段來反對和攻擊黨，反對和攻擊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反對和攻擊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事業和革命文藝隊伍，反對和攻擊革命。

從胡風分子來往的密信中可以看到，在全國解放以前，他們把中國共產黨當做不能“妥協”的“敵人”，而衷心擁護蔣介石國民黨的反人民內戰，把他們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反人民內戰的勝利和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失敗上。他們為了配合蔣介石國民黨的行動，就利用他們暗藏的地位，在背後向黨進攻，有如胡風自己說的，“再接再厲”，“一面流血一面走”，“抱着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向黨“作戰”。他們使用一切“戰術”和“戰法”同黨“作戰”，甚

麼“悶棍”啦、“火箭”啦、“集束手榴彈戰法”啦，“打傷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傷痕”的“橡皮包着鋼絲打囚徒的鞭子”啦、“用微笑包着侮蔑”啦、“先變成老爺們，再來和變成了老爺們的自己作戰”啦，佈置“疑陣，使他們看來遍山旗幟，不敢輕易來犯”啦，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報紙上建立“配合的小據點”啦等等，真是五花八門，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極其鮮明也極其尖銳地表示了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力量的仇恨，說甚麼“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在全國解放以後，他們也極其鮮明極其尖銳地表示了他們對於新中國和新社會的更加瘋狂的仇恨，並把希望寄託在反革命的復辟和人民革命政權的倒台上。他們說，“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他們咒罵中國人民的革命政權是甚麼“髒臭的鐵壁”，“殭屍的統治”，“枯黃的葉子”，“腐朽的屍體”，詛咒中國人民革命政權的“滅亡”和“嗚呼完蛋”。他們從這種反革命立場出發，進行着更加有組織、更加隱蔽、也更加擴大了的反革命活動。

可以看出，這個集團的活動遠遠超出了文藝界和文藝問題的範圍。他們誣蔑和攻擊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誣蔑和攻擊黨的中央和中央負責同志，誣蔑和攻擊黨在文藝方面的負責同志，誣蔑和攻擊黨所爭取團結的一切進步作家和革命知識分子，這一切都是一種政治行爲，都是他們在對黨、對人民、對革命的態度上表現他們同我們的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完全一致的立場。而他們結成集團，到處“爭取人”，“聯絡人”，擴充“實力”，“開闢工作”，建立據點，安插活動地盤，直到打進我們的黨內、軍內、國家機關內和各種羣衆團體內來發展和擴大他們的活動，這一切都是一種根據某種陰謀目的而採取的組織路綫，而這條組織路綫在一切方面都是適應了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的反革命陰謀的需要的，比方說，就是適應了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的潛伏活動的需要的。更不必說，他們千方百計地打進我們黨內、軍內、國家機關內和羣

衆團體內，進行建立據點、擴充“實力”、探聽情況、盜竊文件等等活動，就是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直接的反革命活動。

從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人數看來，他們已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他們散佈在全國相當廣大的地區和部門。他們已經打入我們某些國家機關，某些軍事機關，某些文化機關，某些經濟機關和某些羣衆團體的領導機關。他們還特別採用了“鑽進來”和“拉出去”兩種辦法，打進了我們黨內，其中有些人還竊據了黨和國家工作的負責職位。他們還在學校裏以青年爲對象發展組織，使不少青年繼續受到他們的蒙蔽和毒害。這個集團特別利用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治手段來進行活動，極力散佈個人崇拜的思想和習氣，大力培植自我吹噓、互相吹捧、目中無人的狂妄心理，有意識地提倡在政治問題上說假話，並且有計劃地進行挑撥離間、散播流言蜚語、製造分裂和混亂等等活動。這個集團特別利用了我們黨內某些人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犯了思想錯誤或政治錯誤，抱有驕傲自滿和對黨不滿的情緒，在這些同志喪失政治警惕性的條件下進行“爭取人”、“聯絡人”、擴大“實力”、建立據點、打聽情況、盜竊文件等等反革命活動。把這一切集中起來看，他們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的陰謀目的就是企圖從思想上和政治上來瓦解我們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

這個集團還特別施展了兩面派的手段來進行各種反革命陰謀活動，就這一點來說，他們是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他們把他們的活動用文藝的幌子掩蓋起來，造成一種印象，彷彿只是文藝問題上普通性質的爭論；他們集中攻擊黨在文藝方面的一些負責同志，也造成一種印象，彷彿只是文藝界內部的派別鬥爭；他們還特別採取了“順着”黨和人民的策略來掩蓋他們對黨的進攻，還造成一種印象，彷彿他們在政治上還是“追隨”黨和革命的。而真面目的胡風及其集團却是“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向黨發動一個進攻又一個

進攻。在他們的進攻失敗以後，他們就趕緊佈置有計劃的退却，每人準備一篇假檢討，企圖在主要的政治問題上蒙混過關，企圖繼續掩藏他們的政治面目，保存他們的反革命“實力”，以便胡風自己和他的集團能夠繼續潛伏下來，等待時機，捲土重來。

反革命的胡風集團對於革命事業的嚴重危害性就是這樣：他們偽裝革命，混入革命隊伍裏面來進行反對革命的陰謀活動。他們的政治面目是被小心地掩藏起來的。表面上看起來，他們似乎並不是異己分子，相反的，有的是共產黨的朋友，有的還取得共產黨員的稱號。他們的力量就在於：打起革命的假招牌，披起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騙取了黨和羣衆的信任，利用了這種信任混進了我們的黨內、軍內、國家機關內和羣衆團體內來進行反革命的活動。正如人民日報編者按語所說，“像胡風或類似胡風的這種冒稱革命的偽裝分子當然是少數，但是爲害却甚大。他們可以鑽進我們黨內、軍內、國家機關內、文化機關內、人民團體內和企業機關內，做出許多壞事來。如果我們不提高警惕，不把他們的問題弄清楚，不把他們的破壞活動加以制止，而讓他們‘聯絡人’，‘爭取人’，‘從事開關工作’，‘大大地加強實力’，即是說讓他一天一天發展和擴大下去，他們就要用他們的‘集束手榴彈’給我們的革命事業以嚴重的損害。”

四

事實證明，以胡風爲首的這個反革命集團是有綱領的。他們的綱領就是偽裝擁護馬克思主義而反對馬克思主義，偽裝擁護共產黨、擁護人民、擁護革命而反對黨、反對人民、反對革命。而因爲革命文藝界乃是他們據以進行反黨、反人民、反革命、反馬克思主義的活動的主要地盤，他們就特別瘋狂地反對黨的文藝觀點和文藝政策，反對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反對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和文藝隊伍，反對黨在指導文藝工作方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

則和組織原則。這就是胡風在他的密信中所說的他們的“事業”。他們的這個綱領是用各種假招牌掩藏起來的。他們長期地小心地掩藏這個綱領，只是因為他們生怕在人民面前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目的。試問，如果胡風集團不是反革命組織，他們爲甚麼生怕在人民面前公開而坦白地表明自己的綱領，而要想方設法用各種招牌來掩藏自己的綱領呢？一個革命的政治派別，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政治派別是不需要隱瞞自己的觀點和綱領的，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性和正確性，並且力求說服人民羣衆相信他們的觀點和綱領。而胡風集團既然想方設法要在人民面前掩藏自己的政治主張，掩藏自己的觀點和綱領，這只能證明他們是一個反革命的集團。

事實證明，以胡風爲首的這個反革命集團是有組織的。胡風在給胡風分子滿濤的密信中，就要後者“遵守組織原則”，說甚麼“組織原則是保證鬥爭的”，這就證明他們有自己的嚴密組織和組織原則。他們的組織和組織原則，對黨、對人民、對人民政府都是不公開的。試問，如果胡風集團不是反革命組織，他們爲甚麼要把自己的組織隱秘起來呢？在革命隊伍裏，在人民中間，在人民民主制度下面，分明只有反革命分子才需要建立自己的不公開的、隱秘的、非法的組織，因為這是適合他們所處的非法地位和暗中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目的的。

事實證明，以胡風爲首的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活動是隱蔽的，並且是以採取兩面派方式爲特點的。說他們的活動是隱蔽的，這就是說，他們是背着黨、背着公衆、背着人民而在暗中進行的。他們的彼此來往是隱蔽的，互相通信也是隱蔽的，還用了許多代號和暗語。說他們的活動是以採取兩面派方式爲特點的，這就是說，他們是明一套，暗一套。在公開場合，他們講的儘是假話；而在隱蔽場合，他們才講他們的所謂“私房話”。在政治問題、對黨、對人民、對

革命的態度)上,他們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偽裝的、虛假的、騙人的。試問,如果胡風集團不是反革命組織,他們爲甚麼要背着黨、背着公衆、背着人民進行隱蔽的活動呢?他們爲甚麼在政治行爲上要裝假,要說假話,要用兩面派手段來騙人呢?背着黨、背着公衆、背着人民進行隱蔽的活動,對黨、對公衆、對人民說假話和玩弄兩面派手段,這一切都只是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才需要的。我們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歷史證明,凡是在革命陣營內部進行隱蔽活動和玩弄兩面派手段的個人或集團,他們的活動都是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在革命陣營內部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最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是他們所施展的兩面派手段。我們知道,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想在短期內就被揭破,他們就必定要戴上各種假面具,打起各種假招牌,在自己的政治行爲上說假話,玩弄兩面派手段。因爲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就不能保持其暗藏的地位,就不能騙取黨和羣衆的信任,就不能繼續進行他們暗中的破壞勾當。這要算是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共同的特點。

胡風集團就是這樣,他們善於偽裝,善於在政治問題上說假話,善於施展兩面派手段。這就是說,他們決不是那樣笨拙的,而是十分狡猾和陰險的一羣反革命黑幫。他們不但有很靈敏的反革命感覺,而且懂得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他們用文藝做幌子掩蓋了自己的真正面目,使人們只能看到他們的外貌,甚麼“理論家”、“批評家”、“小說家”、“詩人”、“教授”等等,而看不到他們的反革命的靈魂。他們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方針和文化政策,痛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仇恨共產黨所發動的關於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和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却要在表面上“順着”講,有時還喊幾聲“擁護”,並且還要用摘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著作的個別字句來

給自己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他們幹的是反革命的勾當，是“集束手榴彈”，是“用橡皮包着鋼絲打囚徒的鞭子”，是“孫行者鑽進肚皮的戰術”，而爲了騙過黨和羣衆的眼睛，却不用一切最漂亮的革命詞句來裝扮自己，甚麼“與人民共命運的立場”，甚麼“符合黨的政治綱領”，甚麼“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甚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甚麼“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等等。他們隨時都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伺機向黨進攻，而在向黨進攻的同時，却會“送上入黨申請書”，“應參加的文藝活動和社會活動都是積極的參加……不推托，不沉默”，也“不對任何人發甚麼牢騷”。

他們在玩弄兩面派策略方面，很懂得靈活運用。他們很有一些反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很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他們懂得“爭取人”，“聯絡人”，“加強實力”，建立“據點”，不斷擴大他們的反革命組織。他們懂得“準備條件”，“多一些條件，再多一些條件”，“埋頭工作，在羣衆中做好工作”，爲他們的反革命活動創造“羣衆基礎”。他們懂得進攻，不“在陣地未強固前就放起槍來”，“小東西小事情最好不理”，一旦“看準了時機”，他們就組織力量，“找大的對象”，對革命的要害加以攻擊。他們也懂得在進攻時隨機應變，採取各種不同的戰術，或者無中生有，當面造謠；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的現象，攻擊事情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努力“打開一個缺口”。他們還懂得退却，在他們處於不利的情形下，爲了保存他們的“實力”，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採取以攻爲守的策略，或者先發制人，打出幾個“悶棍”；或者“裝死躺下”，等待“反攻時機”；或者避實就虛，每人準備一篇假檢討，或者分散隱蔽，各自“在忍受中求得重生”。

斯大林教導我們：“檢驗某個集團、某個派別、某個政黨的革命性，不是根據它們發表什麼樣的聲明或宣言。檢驗某個集團、某個